

# 野百合學運與台灣民主發展

●李西潭／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

## 壹、前言

1980年代後期是個風起雲湧的時代，台灣社會正歷經著劇烈的變動——從宣布解嚴到解除報禁、黨禁，社會隨著各種聲音與力量蠢蠢欲動，各種團體所發起的社會運動蓬勃發展，台灣遍地瀰漫著一種騷動隨時而出、不安於室的氛圍，而這股澎湃、新生的風潮，自然而然地也蔓延到校園內，使得成為聚積社會能量的一個重要場域。

在1990年3月13日，遷台四十年來從未曾改選過的國民大會，又自行通過「臨時條款修正案」，將1986年所選出的增額代表任期延長為九年，創下國會議員自行通過延長任期的惡例。同年3月16日到22日，六千名來自台灣各地的大學生集結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上靜坐抗議，他們提出「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以及「政經改革時間表」等四大訴求，這樣從校園而出的大規模社會運動，使得當時執政當局必須正視社會長期以來受到壓迫的聲音，李登輝總統在3月21日接見五十三名學運代表並允諾在同年6月28日，於台北市圓山飯店舉行「國是會議」，與會各界代表除了國民黨政府高級官員外，還包括美麗島事件受刑者、民進黨領導人和海外黑名單人士，針對「國會改革」、「地方制度」、「中央政府體制」、「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憲法與臨時條款修正方式」等五組議題召開此次「朝野協商」，最後達成「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回歸憲法」、「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修憲採取一機關兩階段方式」、「修憲以『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名之」等共識，並透過法定體制逐一落實。

回顧二十年來台灣民主發展的過程，在1990年「野百合學運」獲得了政府的回應，促成動員戡亂臨時條款的廢除，並終結萬年國會的運作，使得台灣民主改革的工程進入另一個全新的階段。

## 貳、青年與時代脈動

青年學子一直都是促成社會進步的動力，綜觀世界各地所發起的學生運動，從1968年法國的「五月學運」、美國六〇年代的黑人民權與反越戰運動、到1989年中國的「六

四天安門學運」以及1990年台灣的「野百合學運」，都代表著青年人崇高的理想性以及對於兼顧邏輯理性與激烈感性的社會改革訴求，而箇中代表不只是國家與社會菁英從體制內外作出突破與變革，也從文化與藝術上批判現有固有僵化的傳統，就猶如火山噴發滾熱岩漿覆蓋衝撞現在的地表。六〇年代美國的學生反戰運動，伴隨的是嘻皮文化的興起。嘻皮文化批評西方的中產階級價值、反對核子武器、反越戰，要把美國從戰爭的殘暴、舊道德觀和物質主義中解放出來。他們相信，愛會取代恐懼，小社群可以取代父權的家庭制度和大眾社會的集體異化。其中追求愛與和平的態度，完全是回應冷戰結構下戰爭的隆隆鼓聲。那個時代最有名的口號是「做愛不作戰」(make love, not war)，其中最著名的照片則是一名女嘻皮把花朵插在軍隊的步槍口。如此成就了被譽為六〇年代全球青年造反運動的代表時，帶著叛逆因子經由音樂、書刊、影像的傳布，美國青年的嘻皮文化運動，也浸染到了台灣文化與社會——翻開各個學生刊物都可以發現這批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少年大談存在主義、卡夫卡、卡繆、搖滾樂、邏輯實證論等來自西方國家的藝文與思潮。不過，政治與社會議題還是不能直接碰觸，只能委婉道出。這樣的思潮到了八〇年代經濟起飛的台灣，則讓社會版塊大規模的重組。再加上1989年中國「六四天安門學運」的發生，當時中共領導人趙紫陽企圖結合學生推動政治改革，卻挑起共產黨內部保守且強硬派的反撲，最後趙紫陽等改革派則遭到罷黜或入獄，而中國的自由化也暫時中止。在中國「六四天安門學運」的推波助瀾之下，也讓台灣民主化過程的野火點燃，眾生喧嘩的社會運動正式風起雲湧。

### 參、台灣民主轉型的特色

從民主轉型 (democratic transition) 理論中我們可以知道，從威權轉變到民主的一段歷程，在轉型期間中，某些民主的形式已經奠立，但仍有某些屬於威權政體的殘餘；轉型期不一定是暫時或是短期的，且不一定是直線或是不可逆轉的。而威權體制轉變到民主體制的轉型方式有哪些，一般而言，可以區分成三種：

1. 變革型轉型 (transformation)：此種轉型是由執政菁英帶頭實現的，當政權的控制能力逐漸減弱，甚至引起統治正當性疑慮時，執政菁英會進行政治改革，而企圖鞏固其政權，繼續執政。例如匈牙利、保加利亞等。

2. 替換型轉型 (replacement)：此種轉型是由反對派團體帶頭實現民主，且常常伴隨著威權政體的垮台或是被推翻。此種轉型模式屬於激烈的轉型，國家往往會有巨大的變革，例如葡萄牙、菲律賓的經驗。

3. 移轉型轉型 (transplacement)：當民主化是因為政府與反對派協商之後採取聯合行動而實現時，便出現所謂的移轉或漸進式改革，也有人稱為「協商式轉型」。例如韓國、西班牙 (1975~1981) 的經驗。

而從台灣經驗來看，由於國民黨政權特殊的政體型態，因此台灣的轉型模式也與傳統定義的移轉型轉型有些不同，這主要因為國民黨所選擇發動轉型的時間使它有辦法單方主導轉型期間改革的議程。因此，台灣的轉型帶有很強烈的政權延續性，不但執政菁英繼續在位，很多舊體制的規則（例如中華民國憲法）也被保留下來在新體制中。因為國民黨在轉型過程中，操縱了轉型的過程、速度與方向，因此台灣的轉型經驗也可稱為「操縱式漸進轉型」（incremental transition through manipulation）。

台灣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具有什麼特質，總結歸納有以下幾項：

### 1. 台灣的民主轉型是第一次從無到有的過程

無論民主政治中最起碼的「選舉的民主」或是較周詳定義的「自由的民主」，學者們普遍認為台灣過去並沒有民主的經驗。民主在台灣，是人類普世價值在東方實現，也是亞洲文化在現代開放社會的新典範。過去的台灣是一個缺乏民主經驗的社會，從歷史看來，台灣有很長的被殖民歷史，之後又是國民黨專制政權統治數十年的時間，統治的權威一直都沒有可被更替的可能。此外中央的民意代表不曾改選，而執政黨也透過戒嚴令的實施，打壓反對勢力的集結並監控社會，以期維持統治之穩定與正當性。這樣的情形，要等到1987年解嚴及開放報禁、黨禁之後，政治改革的機制開始啟動以及政治自由化腳步的到來，民主政治才開始在台灣政治歷史上嶄露頭角。

### 2. 台灣民主轉型的開端奠基於高度經濟成長且相對穩定的政治環境中

台灣在1960年代之後，由於政府的產業政策使得台灣擁有傲人的經濟奇蹟和高度的經濟成長，被列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員。政治上，台灣長期處於軍事戒嚴狀態，在黨國機器嚴密的監控之下，台灣從未發生軍人干政與政變的情形。而政治與經濟上的相對穩定，也與拉丁美洲國家在民主化過程中不同。這與白魯恂（Lucian W. Pye）的觀察有所不同，Pye指出：「經濟發展將導致民主轉向與促成多元主義的興起，並因而削弱發展中國家之威權統治基礎」。正因為處於這樣的有利位置，因此更能夠循序且穩定的開展民主化。

### 3. 台灣民主轉型是由執政黨改革派與反對黨溫和派進行協商邁向變革模式

台灣的民主化過程中，可以看出執政的國民黨改革派扮演重要且決定性的角色，並逐漸帶領國民黨由一個威權且排他性的政黨，而轉型成為民主、競爭的政黨體系。為了達到政治改革的目標，國民黨改革派與民進黨的溫和派進行協商與合作，並且逐漸削弱黨內保守派的勢力，以利民主化的推行。國是會議的召開，除了正當化李登輝的改革路線，同時也提供在野勢力一個影響民主化的議程。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曾指出：政治菁英中進行談判和妥協，是民主化過程的精髓。而這種民主交易，使得在民主移轉的過程中，政府與反對勢力都不得不訴諸妥協和穩健。在台灣的经验中，政治菁英的協調合作過程和平祥和，雖有少許暴力事件的發生，但是沒有對立的情形。這種和平

的轉型模式，理性以及祥和成爲台灣民主轉型的卓越表徵。

## 肆、從野百合學運到野草莓學運

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對於台灣民主化的過程有推波助瀾的效果，青年學子從社會層面由下而上的力量影響了政治層面的轉型，使得當時無論是國民黨內或是黨外的政治菁英有了機會共同促進台灣民主化，而這樣的成果正是台灣人民的公共財。而台灣的民主化從政治轉型到民主鞏固，所謂的「學運世代」也紛紛走入社會，成爲了學術圈、社運圈以及政治圈的菁英，譬如在政治圈有馬永成、林佳龍、羅文嘉、郭正亮、李昆澤、鄭麗文、段宜康、顏萬進、鄭文燦等；學術圈有范雲、李易昆、何東洪、林國明等；而其他像是陳裕鑫、陳正然等也投入其他社會的崗位上。上述這些都曾經是「學運世代」的重要成員，他們也正面對價值上許多的衝突，正如美國嘻皮運動的學生在1990年代走入社會中，也必須面對成爲社會的中堅分子是否能夠堅持當初年少的理想，能否在社會現實的要求下依然故我的「天真狂傲」？還是變成一個「成熟世故」的人？這之間的衝突不言可喻。

當年的野百合學運分子在分道揚鑣後面臨了價值與現實的衝突，不過儘管如此，理想依然是青年學子最大的資產，許多青年學子在國家遭逢民主化倒退疑慮時仍然前仆後繼地發聲，譬如2008年陳雲林訪台期間，人民所應擁有的示威、遊行與抗議等反對的聲音均受到嚴重的壓抑，這其中不僅檢討警方執法是否過當的問題，而是根本性的自由與人權遭到政府嚴重侵犯，因此學生與教授自主發起運動，針對政府一連串侵害人權的行爲提出抗議也提出三大訴求：「總統馬英九和行政院長劉兆玄爲此必須公開向國人道歉」、「警政署長王卓鈞、國安局長蔡朝明，應立刻爲此下台」、「立法院立即修改限縮人民權利的『集會遊行法』」，並且透過網路投票決定將此波運動命名爲「野草莓學運」——以有刺的野草莓，一方面表示對媒體社會動輒將年輕人稱爲「草莓族」的不滿，另一方面也向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致敬。

## 伍、結語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這是篤信的時代，也是疑慮的時代；這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絕望的冬天；我們什麼都有，也什麼都沒有；我們全都會上天堂，也全都下地獄。」英國大文豪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曾以這段話爲其以法國大革命爲時代背景所撰之名著《雙城記》作爲開場的引言，這正也可作爲當今台灣民主鞏固與中國民主化的最佳對比。中國自六四天安門學運至今，不見政治上的轉型，反而看見更極端的打壓，其中以兩個新聞事件來看就可以發現中國對於人權的改善實在有很大改進的空間：

1. 中國民主運動人士劉曉波，2008年底因起草《零八憲章》，呼籲中國政府進行政

治改革及保護人權而遭拘禁，2009年6月以涉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遭到逮捕並判處劉有期徒刑十一年，剝奪政治權利兩年。

2. 2010年初 Google 宣布，由於其中國網站遭駭客入侵以及網路搜尋受到限制，因此恐撤出中國，雖然最後有所折衷但也造成國際震撼。中國透過網路警察與駭客箝制網路言論自由，屢見不鮮。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嶸更觀察入微地指出，中國要進入先進的民主國家，必然要從人治走入法治的體制中，「中國傳統文化很多規則是模糊的。有人現在提出來要重回孔孟之道，孔孟之道能救中國嗎？救不了，唯一能救中國的只有憲法。」也就是中國民主化必然要透過憲政體制的建立才能落實。儘管如此，我們仍然能夠將點燃中國民主化野火的種子寄情於社會新一波的草根民主運動，那就是「網路民主」——如此伴隨著資訊革命發展導致了「網路民主」時代的到來，再加上手機的方便使用，這毋庸置疑地將促成中國「民主化運動」的普及與壯大，使中國少數人專權的黑箱政治，再也無法擺脫外部世界的目光。在這樣一個時代，任何局部政治封鎖、資訊壟斷都將成爲不可能。因此，我們可以期盼在這樣網路資訊如此發展的年代，新一波的草根民主運動正在使台灣民主鞏固，也正在讓中國的民主化開始萌芽。◆